

西安營研習心得報告

耿勇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地點設在古都西安，主題也設定為“關中·外緣”。在為期十一天的研習活動中，除了在陝西師範大學聆聽諸多研究文學、歷史、考古的專家學者的演講外，更在寶雞周原、寧夏固原、西安一帶進行實地考察，遠遠逸出“關中”的地理和文化範圍。總的來說，參加這次歷史研習營，我有以下三點體會和心得。

一是切身體會到了“文本”與田野調查之間的關聯和重要性。開營的第一天，王明珂院士在演講中反復提醒我們在自己的研究中，需要特別留意“文本”與“表徵結構”、“範式化的文本與表徵”等問題，運用“移動多點的田野”，從差異與斷裂中發現問題。然而，真正切實體會到“文本”——尤其是“結構化的文本”，與田野之間的關係，則是從研習營第一個田野考察地寶雞岐山縣周公廟開始。抵達周公廟前，根據事前提供的田野閱讀材料以及從網絡搜集來的信息，我以為周公廟只是一個祭祀周公的國家正祀的場所。然而，當我們實際踏查周公廟，並閱讀立於碑亭內的清代、民國的數通碑刻之後，卻發現在這一歷史時期內，當地住民創造性地將以“祈子”為訴求的姜嫄信仰添加進周公廟這一信仰“場域”中間；每逢廟會，姜嫄殿更是成為周公廟的中心所在。儘管在周公廟停留的時間並沒有很長，然而卻由此讓我認識到了方志這類“結構化的文本”與田野調查所能看到的地方性知識之間有趣的張力。

二是如何在田野中理解民間文獻。參加此次研習營，非常有幸能夠成為張侃老師所負責小組的成員；考察活動中間，張侃老師反復向我們強調，解讀所發現的民間文獻的時候，需要特別留意思考其背後的人群組織。在張老師的啟發和引導下，我們嘗試分析了周公廟中的碑刻，發現圍繞著姜嫄信仰，當地的人群組織形式比較複雜，既有里甲或保甲這類正式的行政組織方式，也有依照自然地理結合而成的村落，更有“祈子會”這種跨地域的社會組織網絡。之後到了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進行田野調查，又有了更加深刻地體會。儘管營方當初安排我們參觀須彌山石窟，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配合之後演講中有關絲綢之路、佛教造像的內容，然而在實地考察中，三通明代前期的碑刻卻引起了我對於明代固原當地人群組織的進一步思考。這三通明碑，一通立於大佛樓前，另兩通位於圓光寺前。根據碑文及背陰上的題名，除了看到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這兩股勢力在須彌山石窟的角逐、競爭以外，也看到隱藏於背後的藩王、勳臣、衛所、苑馬寺這四類人群。在張侃老師的啟發下，促使

我進一步地思考，作為明朝防禦北方蒙古的前線，固原的人群是如何組織起來的？其中，當地族群的變化又與須彌山的信仰組織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聯繫？其實，配合著參觀固原博物館和彭陽縣境內的姚河塬遺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生活在固原這塊土地上的族群並不是單一和固定的，而是具有多元性和流動性的。因此，明代固原地方的族群和組織形式，是一個非常有趣而且值得深究的問題。

三是所謂的“中心”與“邊緣”的問題。本屆研習營的主題是“關中·外緣”。實際上，無論是分組討論，還是綜合討論，儘管發言者匯報的具體內容不盡一致，但有很多討論不約而同地涉及這兩者的關係。經歷這次研習營的活動，我自己也深有體會。在我所研究的歷史時段中，關中，乃至整個西北地區，應被歸為明帝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外緣，表面上看起來似乎難以企及周、秦、漢、唐等朝代。在我看來，我們現今討論“中心”與“外緣”的問題，絕對不是將“外緣”製造/建構成為另外一個“中心”，而是反思當這種歷史情境確定產生之後，生活在這些地方上的人和社會組織，是如何調試、表達、實踐這種歷史變化，進而思考來自“中心”的王朝統治策略與地方的生存邏輯之間的互動關係。另外，“外緣”也絕對意味著不重要，“此”的外緣，同時也是“彼”的外緣，是一個想要創造“確定關係”的地帶，更會引起紛爭。因此，雙方的“中心”才會在這些“外緣”部分，挹注大量的經濟和軍事資源。明代所謂的“陝西四鎮”或者“九邊”，也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出現和發展。